

NÜ XING
YU JINDAI ZHONGGUO SHEHUI

LUOSUWEN ZHU
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

女性
与近代中国
社会



C15390598

罗苏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美娣
美术编辑 孙宝堂

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罗苏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6.75 插页9 字数399,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3-02422-7/K·589

定价: 28.00元

目 录

导言	1
----	---

千年一遇之变局

一、“男女有别”：农耕文明的遗产	9
1. 牛郎织女和桃花源	9
2. 家长、女眷	17
3. 卑贱的一半	28
4. 无言的对话	38
5. 柔弱为美	44
二、西潮惊岸：福音与礼物	56
1. 福音网络与女性	56
2. 最初的女学校和女学生	66
3. 告别校园后的选择	75
三、上海滩的女人	86
1. 织女改行	86
2. 海上花开	94
3. 不甘寂寞的娇藏者	103
四、挑战者的风采：自办女学	113
1. “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113

2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2. 新瓶装旧酒	120
3. 春潮挡不住	137
4. 塑造“国民之母”	145
5. 超贤妻良母主义登场	156
五、俗易风移:民初女性妆饰	168
1. 海式包装:由从众而异众	169
2. 故都:洋装渐起	178
3. 西部的呼应:细波微澜	182
4. 废缠足——脚的解放	191

厚土与金边: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

六、生死场:农妇的命运	205
1. 南北差别比较:定县与江村	205
2. 劳动分工局部调整中的农村女性	220
3. 婚俗:被出卖的一生	229
4. 妆饰:盘髻裹足	237
七、失乐园:小城故事	247
1. 女学生与“琉璃瓦”	247
2. 家的囚徒	252
3. 妓业种种	256
八、都市风景线:女性的就业拓展与消费介入	270
1. 学做生意的女人	270
2. 女工的天地	286
3. 女性的闲暇与消费	317

女 国 民

九、女权:从客体到主体	331
--------------------------	------------

1. 婚制中的女当事人	331
2. 夫妻之间	335
3. 二等国民	340
十、发现自我	366
1. 从无我到有我	366
2. 营筑爱巢	373
3. 求学和求职	386
4. 以事业为人生前提	394
十一、女性社会形象的重塑	407
1. 大幕从舞台徐徐拉开	407
2. 文人笔下的“她”	419
3. 从都市仕女到摩登女郎	427
十二、叩开心扉	440
1. 性别禁忌：女性的紧箍咒	441
2. 女界必读：清末民初的女子尺牋	448
3. “娜拉”的困惑	457
十三、妇运与政潮	469
1. 女界先觉——秋瑾的足迹	469
2. 从辛亥到“五四”：东京——北京	473
3. 大革命时期：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	487
4. 赣南的推进	499
5. 血的奠基：长征与女战士	515
结束语：从女人到人	528
后记	530

导 言

女性群体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半。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这一群体的相应变化，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被视为衡量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尺度。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群体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

思考这些问题的起点，首先是将女性群体作为社会人力资源的一部分。对女性人力资源的生产、训练和利用是受到特定生活方式支配的文化行为，而不是任何个人的选择。以农立国的生活方式，曾使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耕织一体、自给自足的家庭经营方式，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产领域从属者的角色。“男女有别”的文化观念象征着农耕文明的精神支柱，得到法律的维护，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代中国无法拒绝的文化遗产。

如果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农耕文明的演进历程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中去考察，那么，它在胚芽发育和走向成熟的两个阶

段上；无疑是处于世界领先之列的，汉唐气象、宋元景观留下了历史的见证。但是在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商业文明过渡，进而揭开工业革命序幕的竞争，中国落伍了。其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经济胚芽，受到了封建王朝闭关锁国方略的遏制，甚至没有来得及独立自主地跨入这一人类文明演进的新纪元。

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在政治上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构成对封建皇权至尊的强硬宣战。固守农耕文明的海疆长城，在东南部被轰开五个缺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于是，在鸦片战争的余烬中，已覆盖着引发文明嬗变的火种。

1840—1949年的百年瞬间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其间中国经历了推翻帝制，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实践。外忧内腐，百孔千疮，此时的中国与其说是睡狮初醒，不如说是座开始融化的冰山，危在旦夕。中国人在咀嚼屈辱苦果的同时，面临着机遇和选择。而对备受压迫、束缚、扭曲的女性群体来说，适应这空前之变局，作出明智的选择，更是一个脱胎换骨、艰难渐进的过程。女性群体的新生只能是伴随中国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商业文明的过渡以及工业化的起步而被提到民族的议事日程上。

由于近代中国商业革命不是传统商业经济成熟更新的结果，而是以首先受到海外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洗礼的条约口岸为突破口，因此，东南五口城市就历史地充当了这一革命最初的发祥地和最主要的舞台。这种工业化因城市化而起步并得到最初推动的特点，客观上结束了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一统状态的延续，形成了区域社会变迁进程与机制上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条约口岸城市充当了文明转轨的试验地，从中崛起了一批最初意义上的近代城市；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楔入而逐步形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潮汕沿海港口城市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构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带。在其周边农村，也因引进电力、组织合作工

厂而率先尝试乡土工业重建的开创性实践。同时,其产生的近代商业文明辐射波由沿海地区向内地传统经济结构形成持续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使沿海城市与内地城乡在文明演进中的原有差距更加明显。两个市场并存的格局,赋予近代意义上的城乡差别、城乡冲突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和不容逆转的趋向。同时都市的超前与乡村的滞后,都市未及引领乡村,乡村已包围了都市的走向,也揭示了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将是一个曲折而渐进的过程。

这一特点使女性群体在近代的趋变因多元文化环境之间“时差”的制约而异彩纷呈。在都市,女性作为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被纳入劳动力市场,使轻纺工业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缩影,都市也成为近代中国新女性的诞生地和最活跃的中心舞台。在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城镇,资源流失,导致地区发展的滞后,女性的变化除了外层的时髦包装,仍是传统角色的复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由于地不敷口,刺激劳动力的流动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女性的谋生手段得到拓宽,自立能力有所增强。这对于引导亿万农妇摆脱依附男性谋生的传统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行的示范。而在广大内地农村,相对单一的种植经营,使农户陷于贫困、破产和隐蔽的移民流动。农妇被逼上梁山,集结于造反求生的旗下,则证实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由此,都市、城镇、乡村就提供了考察近代中国女性群体变化的三种基本的区域文化类型。都市的活力象征着女性发展前锋指向的目标,而城镇、乡村的状况更能反映女性群体总量改变的进程。

在揭示三种区域文化类型对女性群体发展提供不同文化环境的同时,需要对“男女有别”文化观念在近代所面临的挑战与回应,逐一梳理分析。向“男女有别”传统文化观念发起挑战的最初口号是天赋女权、男女平等。炮舰和圣经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藉以打开中国大门,传播新文明的两项武器。从西学东渐(即资本

主义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进程看,条约口岸和传教点构成了最初的传播网络,为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影响进入基层社会建立了最初的渠道。女信徒、女神职人员的出现,暗示着导向社会结构性改变的最初裂痕已经存在。由主要植根于沿海口岸城市的教会女校发端的女子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对开发女性智能,从根本上改善女性对资源占有的劣势地位打开了缺口,由此为女性形象的重塑奠定了基础。中国人尝试自办女校的出现,意味着两种文明的较量已不是简单地依华、洋划分阵营。帝制倾覆和共和创立,使女性群体一展新颜,文学、影剧推出女性引领时代潮流,消费、职业更是挡不住女性的介入。女性显示出她在促进新文化传播方面独特的示范效应。女性形象由传统的样板一跃为趋时的象征。俗易风移,不只具有审美眼光更新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民族焕发生机的开端。

从帝国到民国,由百姓成为国民,一朝实现的改地换天,自然要经历一个新旧混淆、由失范到重建规范的过程。在女性朝着挣脱束缚的大道迅跑时,民国法律的修订记录了女权提升的标志性成果。但同时又有新的荆棘,新的困惑,新的呼喊。秋瑾的启示,“娜拉”的心声,职业妇女寂寞奋斗的脚步,令人欣喜又不无惋惜。这是一组近代女性自强的坐标。她们的思考和选择,留下了一代人的追求和奉献、伤痕和遗憾,也使阻挡女性群体发展的潜在障碍得以显现,令新一代女性无法回避。近代中国妇女运动曾汇成合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洪流,为民族的新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女性从女人到人的转变,在近代中国是个伴随文明嬗变而逐步推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女性群体的发展打破了坚冰,指明了目标,但理想境界的实现还需要几代人的探索、积累。历史赋予中国女性群体的使命尚未完成。近代女性不懈的奋斗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曲折、渐进的轨迹。在当代,这两个过程的相辅相成、互补并进仍是前景诱人,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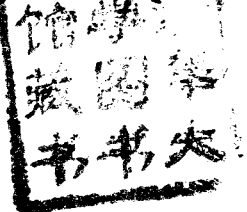
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河,今日女性的身上仍带有昨日女性的影子。只有理解昨天才能清醒地选择今天,适应明天。同时,对女性群体的深入研究也为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视角。要了解各区域文化类型的异同,比较各自文明演进经历的阶段,分析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女性群体的变化无疑是显示社会细胞更新的原始过程的基本素材之一,也为近代中国社会两个文明的较量留下了一页历史的见证。

千年一遇之变局

1640年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文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纪元。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推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成为中国社会变迁在晚清引发质变的历史性标志。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凭借军事优势进入中国,成为干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明清以来,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滋长,因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刺激而获得生机。一部分沿海城市由传统商埠转为条约口岸,进而充当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先行区。这种近代化由沿海城市起步并得到最初推进的特点,使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面临着新的诱惑和选择。女性群体的变化也由此拉开序幕。



C15390598















一、“男女有别”：农耕文明的遗产

“男女有别”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含义，主要并不是指两性生理上的差异，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以农立国、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父权制大家庭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种文化观念滋长的土壤。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嬗变的第一阶段。伴随这一进程，“男女有别”的文化观念受到迅猛而又局部冲击，“男女平等”的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描述这一驱旧换新的观念革命之前，需要对“男女有别”文化观念——这份近代中国所继承的文化遗产略作分析，以了解这场变革的起点。

1. 牛郎织女和桃花源

衣食之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别，两性在生产劳动中最初的分工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显示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镞、石制纺轮、骨针等。有趣的是，作为随葬品的生产工具在组合上似有某种规律：凡用纺轮随葬的墓中，往往伴有石刀、石磨盘、陶器，而没有石镞（箭头）；用石镞随葬的墓中则一般置放石斧、石镞、石凿、陶器，却没有纺轮^[1]。这种暗示墓主性别的差异，透露了两性在生产劳动中最初分工的特点：男子从事渔猎及流动的野

外强体力劳动；女子缝衣、举炊、生育后代，承担生活安排方面的多项劳务。与这种各尽所能、互相依存分工原则相对应的生活方式，是以氏族共同体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以渔猎、采集野生植物为主要谋生手段，以及以对偶婚为特征的婚姻形态。

殷商时代，社会经济由畜牧为主向初期农业过渡，种植业取代野生植物采集成为主要谋生手段，主食由猎物而改为种植物。随之—夫—妻的家庭（户）取代了氏族共同体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主要生产领域的转移和经营单位的小型化，使两性的劳动分工也作出相应调整，在调整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谋生手段和劳动工具。早期农具以石器、木器为主，粗拙简陋。商代遗址中常见的农具有石镰、石铲、蚌器。耒是木制曲柄的起土农具，下端有歧出而锐利的木叉，用以刺地，木叉上贯一小横木，用以脚踏施力起土。甲骨文显示最初的鋤形是、、^[2]，“男”字的出现则与田间耕作有缘：、、，给人一种与耕地亲近的动感；而“女”字作，呈现双手交叉胸前席地踞坐姿态。“父”字为，“母”字为、。此外，“妇”字为，“妾”字为^[3]。这些象形文字再现了两性最初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领域的分工特点：男性被强调的是在农耕操作方面的优势地位，女性被突出的是哺育儿女、操持家务方面的功能和一个恭顺侍者的形象。

以个体家庭为生产、消费单位，务农谋生的普遍化意味着先民们能获得比渔猎、畜牧方式更多的食物，且易于贮藏，能维持较多人口的食用所需。于是居无定所的生活结束，聚落形成，生产资料由氏族所有转为个体家庭私有。西周金文中不仅出现土田之数，而且出现以“人”、“夫”、“家”为计算单位^[4]。家户作为人们血缘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在周代已是事实^[5]。战国后期赋税制度的实施，也以家户为征收单位，分粟米、布缕两类。这意味着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地位大体奠定。随之，农家经营以耕织结合为特征也相应确

立。汉代有民谚：“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从中不难想象农家勤于耕织的画面，体会其谋生之艰辛，果腹完赋之后，往往很难再有更多的积余。

秦汉时代的农家也许并没有想到，他们所创建的以男耕女织为特点的家庭经营方式，竟然会延续千年之久。这段漫长的历史既是顺应自然的选择，也赋予中国人以美妙的想象和世代不舍的追求。

从星辰崇拜到神化故事

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文、土壤)制约着人的生理机能、地区植被，构成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中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南部，滨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多样：山地约占 33%，高原 26%，盆地 19%，平原 12%，丘陵 10%，江河众多。海、陆位置的影响，使中国气候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点：冬季寒冷干燥，南北温差很大，夏季南方普遍高温多雨。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一些河谷盆地，因耕地相对集中，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而成为主要农业区和经济活动中心。

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将亚洲大陆分为东亚、西亚两大部分(彼此在地质、地貌、气候等方面差异极大)，东亚部分由中国大陆和太平洋西海岸大体环绕中国海岸线的半岛、群岛组成。在这一相对狭长的海域，中国大陆悠久的农业生产形成以粟(谷子，去皮后为小米)为主要作物，以耕作集约、人工灌溉为主要技术(在汉代被概括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特点，构成与其他地区传统农业的重要区别，长时期在东亚居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成为区域文明中心^[6]。牛郎织女的传说正是伴随这种农业文明的发展而演变、丰富、魅力无穷的。

神话故事作为俗文学的一种，并非个人创造，而属民族集体的作品，展示的往往是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民族共同的情感和追

求。牛郎织女传说的基本要素源于古人对星辰崇拜的联想。从《诗经》到《史记》都提到牵牛星、织女星，但牵牛被想象为一头牲牛，织女则为天之女孙^[7]。到汉代，牵牛由祭祀的牲牛而演变为牵牛的丈夫，似乎与春秋战国之后私有土地制度出现，铁器制造使犁具改善，牛成为农家耕作的帮手，牵牛的丈夫成为最常见的农夫形象有关。在三国时期，隔着银河分列的这两个星辰已被赋予离别的象征意义：牵牛为夫，织女为妇，隔河相望，一年一会。这一含义暗示了动乱年代家人离散在人民内心留下的伤痕。

牛郎织女传说从最初的星辰崇拜演变为中国农民的理想生活方式的写照，是以东汉与董永故事相嫁接为中介的。董永是个举债佣作养父，继而卖身葬父的孝子。相传上天感其孝德，派神女下凡，乘机杼，织丝帛，助偿债。该传说在南北朝屡被作为石棺画像的题材。这种借助神女的力量完成男子对家族仰事俯育的责任，似含有农户对耕织一体家庭经营方式依赖的某种暗示。女性在家庭经营中虽是基本的劳动力，但两性在劳动分工中男主女辅的格局并未因此而改变。

魏晋时代，牛郎织女式的生活在笔记小说中已作为对仙境生活描绘的内容：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晋张华：《博物志》

粗看这个仙境传说似乎与董永故事无关，但其中将男耕女织

的生活方式搬到仙境再现，既熟悉又不可得，人的理想要通过神来实践。这种心理反映的是长期战乱割据使农民起码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神话故事所给予的精神安慰，就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弥补。以男耕女织求得温饱自给为满足，既是农民的生活要求，也是这个仙境传说的基调，与董永传说正相吻合。而这种追求从神女下凡相助，变为仙境所见，其中既有对理想生活的执著追求，也不无对现实生活状况的失望。

董永传说能以民间口耳相传方式流传至今，值得细究。董永事迹最早见于东汉武梁祠石室（今山东嘉祥县）画像，在唐以前其流布区在华北包括今山东、安徽、河南一带。宋代以后，传入河北。到明清两代向东南扩展，江、浙、鄂、湘、粤、滇、台，都有董永事迹的传说或戏曲演出。其流布范围大体包括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带正是中国大陆耕地最集中，开发最早，耕作相对集约的主要农业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华北地区（以关中、黄河下游平原为主要范围）在西周到秦汉的近千年间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拥有全国人口的70%。牛郎织女的传说起源于这片黄土地是很自然的事。

牛郎织女的区域差别

自汉末到明初，华北经济因南方的相继开发、后来居上而由盛转衰，隋唐时粮食已不能自给。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由北南移，经济结构趋于多元。唐中叶起，水稻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始占首位。到两宋，长江流域成为国内最大的农业生产区，太湖流域、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成为三大养蚕基地，耕有余粮，织有余衣。清初，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中原，与长江流域并称。桑、棉、麻的推广种植使江南成为国内第一大丝织、棉纺织基地。湘赣、太湖流域是稻米最主要的产区，东南沿海地区的浙、闽、粤，则是茶叶、水果及蔗糖的集中产地。种植业向商品化经营的